

一项宏大而艰巨的文化工程

——新编《闻一多全集》整理出版漫论

孙 党 伯

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负责整理编辑的12卷本《闻一多全集》(以下简称新编全集),最近由湖北人民出版社一次推出,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当我们捧读这一卷卷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新书时,谈谈新编全集整理出版的坎坷历程及有关问题,对深入了解这套全集的特点和价值,也许是有益的。

—

闻一多,原名亦多,又名家骅,字友三,1899年11月24日(阴历10月22日)生于湖北浠水下巴河的一个书香门第。5岁入私塾读书,接受传统的经史教育,同时也学习了一些“新学”知识。1910年到省城武昌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念书。第二年爆发了有划时代意义的辛亥革命,他毅然剪去发辫,表示拥护革命的决心。1912年冬,闻一多考入清华学校。在清华求学的近10年间,他不仅较系统地学习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政治学说,而且还大量阅读中国的历史文化典籍,打下了较坚实的国学根底。他积极参加伟大的“五四”运动,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

1922年7月,闻一多赴美国留学,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珂泉科罗拉多大学、纽约艺术学院学习美术,受到了系统的西洋美术教育,专业成绩也很突出,但他对于文学的兴趣却更为强烈,常选修英美近代诗的课程并积极创作新诗。1923年9月他的第一本诗集《红烛》出版。在留美期间,闻一多虽曾得到一些美国友人的帮助与尊重,但也饱尝了作为弱国子民所受的歧视和屈辱,这就愈加激发了他对祖国及其悠久文化的热爱。他参与发起组织国家主义团体大江学会,提倡“文化的国家主义”,其主观目的是想通过振兴中华文化使祖国强盛。

1925年7月,闻一多自美返国。同年秋就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次年秋到上海吴淞国立政治大学任职。1927年秋任南京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后更名为中央大学)外文系主任。1928年1月他的第二本诗集《死水》出版,稍后又列名为《新月》杂志编辑。同年秋,闻一多出任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文学院院长,开始专攻中国古代文学。1930年秋到青岛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2年秋他回到母校国立清华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清华大学南迁,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随校辗转来到昆明,继续潜心研究中国古代文学。

闻一多是在近现代中西文化大交汇、大碰撞中成长起来的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家,他首先是以独具特色的诗人闻名于世的。闻一多的诗作数量并不算多,但却以感情深厚、艺术精美见长。他的诗在内容上的突出特点,就是表现出深沉、热烈的爱国感情,并从爱国爱民的真情出发,表现出对黑暗现实的厌恶,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朱自清称他“是个爱国诗人,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爱国诗人。”^①这评语的后半句似乎有些绝对,但他却把握住了闻一多诗歌的基本精神和特征。在新诗形式上闻一多既善于吸收西方诗歌音节体式的长处,又注意保留中国古典诗歌韵调格律的传统,提出了一套创造新格律诗的理论,主张新诗应具有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并努力进行实践。他的诗作,尤其是《死水》集中的诗正是他倡导的新格

律诗理论的完美体现,标志着新诗的进步,开一代诗风。他所倡导的新格律诗理论和独树一帜的诗歌创作,影响了为数众多的诗人,并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格律诗派,在新诗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闻一多的成就并不限于新诗创作与提倡格律诗理论,他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古代文化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创造性的重大成就,引起了学术思想界更为强烈而普遍的震动。应该说,闻一多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中国古代文学及古代文化研究领域的开拓性贡献。后来他走出书斋,投身民主运动时,能够具有那样强大而普遍的影响力、号召力,同样是和他的新诗创作和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分不开的。

闻一多由一位白话诗人转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并能取得超出前人和同辈的成就,决不是偶然的。他自幼就喜爱诗赋古文,具有坚实的国学基础,在研究中既继承了我国朴学注重名物训诂考据的传统,又广泛吸取现代西方社会学说,如文艺学、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民俗学、人类文化学、心理学等新的理论和方法,因此他的研究不仅考索贻博,扎实可信,而且大胆开拓,新见叠出,在《诗经》、《楚辞》、《庄子》、《唐诗》及神话等领域的工作中都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自成一家言。因此,在以上几个学科的研究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腐败现实引起闻一多的强烈不满,他拍案而起,投身民主运动,成为广大革命青年敬仰的导师。同时,他积极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革命报刊,思想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抗战胜利后,闻一多在反内战、争民主运动中斗志愈坚,影响愈大,引起反动派的忌恨,将其列入暗杀名单。当李公朴被特务暗杀后,闻一多的处境异常危险,但他置生死于度外,大义凛然地坚持战斗,发表了气壮山河的最后一次讲演,痛斥敌人的无耻罪行。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首伟大壮美的不朽诗篇。

二

闻一多殉难以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于当年11月聘请朱自清、雷海宗、潘光旦、吴晗、浦江清、许维遹、余冠英七人组成“整理闻一多遗著委员会”,由朱自清负责。经过朱自清、郭沫若、吴晗、叶圣陶四位编辑者和清华中文系全体同人一年多的努力,《闻一多全集》(四卷)由上海开明书店于1948年8月出版(以下简称旧版全集)。在当时,出版《全集》无疑是对闻一多的最好纪念,也是向敌人的一种示威,反动派虽然能够消灭闻一多的肉体,逞凶于一时,但闻先生的伟大精神和光辉著作却是无法消灭的,必将万古长存。但因当时环境所限,有不少重要遗著未能收入旧版全集。解放后,闻一多家属把他的全部遗稿(包括文章、手稿、笔记、讲课提纲等约500多万字)赠给北京图书馆保存。由于种种原因,《全集》一直未能增补。

1978年3月,闻一多夫人高真向中央领导写信,要求重新编辑出版《闻一多全集》。当时中央宣传部决定由国家出版局安排,并邀请闻一多的学生季镇淮、何善周、范宁等在北京进行整理,但由于工作中的一些具体困难未得到解决,整理工作到1981年6月实际上停顿下来。

1983年9月,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中央宣传部召开了两次会议进行研究,并于1984年3月6日发出《关于整理出版闻一多著作的通知》,指出:武汉大学成立闻一多研究室,新编《闻一多全集》的资料收集与整理工作,交由武大闻一多研究室负责。这项整理研究工作应纳入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并在财力物力上给予帮助。同意武汉大学提出聘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季镇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范宁、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何善周、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胡国瑞、华中师范大学外文系教授薛诚之(现已逝世)5人担任整理新编全集的顾问,指导和协助研究工作。根据《通知》的精神,武汉大学立即在中文系抽调人员组成闻一多研究室,承担整理闻一多遗著、编辑新的《闻一多全集》的任务。

整理闻一多遗著,编辑出版新的《闻一多全集》是一项宏大而艰巨的文化工程。闻一多是我国现代杰出的诗人、学者和民主战士,他一生热爱祖国,勤奋奋进,追求真理,经过长期的探索,终于在现实的教育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推动下,走上了为争取人民民主和民族解放而斗争的道路,并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在新诗创作和古代文学研究等方面的卓越成就,丰富了我国的文化思想宝库,确立了他在现代文学史和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他“拍案而起”,为民主而英勇奋斗,坚贞不屈的伟大精神和崇高人格,赢得了广大人

民的敬仰和赞颂。闻一多是我们民族的优秀代表,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和榜样,在国际上也具有广泛的影响。他那等身的著作是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将它们全部整理编辑出版,无疑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宏大工程。但就整理编辑和出版而言,这项工程又是颇为艰难艰巨的。闻一多博大精深,著述宏富,有诗歌、文艺评论、杂文、书信、日记、学术论文、论文提纲、讲义、札记、校勘、注疏、选本、资料汇编等等,种类多、数量大,但是这些著作在作者生前公开发表和出版的只占少数,如出版的单本著作仅有《红烛》、《死水》、《岑嘉州系年考证》、《楚辞校补》和《冬夜草儿评论》(与梁实秋合著)5种,多数为未刊稿,其中一部分已经朱自清等整理收入旧版全集,大部分保存于北京图书馆。由北图保存的这批未刊手稿多为未定、未完稿,有的一题多稿,有的体例不一,有的行文不连贯,必须经过整理才能收入新编全集。同一般现代作家的全集多是根据作者生前自编的单本著作编辑而成的情况相比,整理编辑闻氏全集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北图已将闻一多手稿定为国家文物,我们根本无法看到手稿原件,只能根据手稿照相复印件进行整理,而有些复印件字迹模糊不清,极难辨认,这就更增加以整理的难度。

新编全集的出版工作也历经了坎坷。最初中央宣传部在《通知》中提出新编全集交由人民出版社审定出版。开始,人民出版社对此项任务态度十分积极认真,不仅迅速为我们提供了闻一多手稿照相复印件,还与我们一起商定整理编辑计划,希望新编全集能够尽早面世。闻一多研究室成立后,即着手搜集资料,整理手稿,确定编辑体例,经过全体成员的努力和诸位顾问的指导,于1985年12月提出新编《闻一多全集》的分卷目录,送请人民出版社审定,并广泛征求意见。不巧正碰上人民出版社和三联书店分家,出版新编全集的任务划归三联负责。接着,出版系统进行体制改革,要求各出版社经济独立,自负盈亏。刚从人民出版社独立出来的三联书店,自称底子薄,缺少承担出版新编全集的财力,我们和三联曾分别向有关领导部门反映这一新的情况,请求资助,但均无结果,以致使新编全集的出版难题长时间悬而不决,整理工作也受到影响。1987年底,眼见新编全集在北京出版无望,我们便与湖北人民出版社联系,要求由他们出版《闻一多全集》,该社总编辑卢福咸当即表示同意,并为落实此项任务进行了努力。随后,湖北人民出版社、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和闻先生的家属分别给湖北省有关负责同志写信,请求支持,以便使新编全集能在闻先生的故乡湖北出版。当时主管文教工作的副省长王利滨对此事十分重视,于1988年3月给湖北人民出版社拨款,资助新编全集的出版。搁置数年的出版难题终于得到解决,整理工作随即全面启动。1993年初,新闻出版署特将《闻一多全集》增列为“八五国家重点图书”。

三

前已说过,闻一多著作种类繁多,情况又较为复杂,采用什么体例,将这些著作编为一套全集并自成体系,是我们在整理编辑工作中首先碰到的一大难题。有的同志出于对朱自清等著名学者主持编辑并产生巨大影响的旧版全集的尊重,曾提出新编全集应将旧版全集四卷按照原样放在前面,而将新收入的文字另行编辑置于其后。我们也曾考虑按照这一意见办理,但在实际编排时发现许多问题难以解决,特别是新收入的文字不仅种类超过了旧版全集,而且其篇幅是旧版全集的数倍,若将其放在旧版全集之后,则必然显得前后不相称,且有损新编全集的完整和系统。经过反复认真讨论,并广泛征求意见,我们现在采取的编辑体例是,将闻一多的全部著作包括旧版全集、未刊手稿和佚文统一编排,大体采用分类编年的方法,即先按内容分为诗歌、文艺评论、散文杂文、神话、诗经、楚辞、汉乐府、唐诗、庄子、美术、书信等大类,每一类文章又按写作或发表的先后编次,时间不明或无法归类的则作变通处理。由于各类的文章多寡不一,故采用同类分卷或数类合卷的办法,以保证全集各卷的篇幅大体相当。从实践看,新编全集采用这样的编排体例还是较为科学的,既能全面而系统地展示闻一多的精神品格和学术成就,也有利于不同层次、不同专业的读者的学习和研究。同时,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旧版全集的编辑情况,特将旧版全集的郭沫若序、朱自清序和编后记、吴晗跋附录于新编全集第12卷卷末。

新编全集的编辑原则是力求全面和真实。全面,就是把现在所能搜集到的闻一多的诗文和可以整理成文的未刊手稿全部整理编入。但闻一多参加签名的集体的声明、宣言之类,不属他个人的著作,故未收。与旧版全集相比,新编全集的篇幅增加了两倍以上,各卷都有新增加的内容,只是增加的数量多寡不一。第1卷诗歌增加了闻一多最早的未刊诗集《真我集》、集外佚诗27首、旧体诗赋24篇,译诗增加了21首,至此,闻一多创作和翻

译的诗歌全部都收录在本卷中。第2卷文艺评论,散文杂文共收文章109篇,旧版全集收录这类文章为47篇。第3卷神话编新增文章2篇,诗经编上和第4卷诗经编下新增著作4种,篇幅约为原来的两倍。第5卷楚辞编增加论著13篇。第6、7、8卷为唐诗编上、中、下,上编增加论文7篇,中、下编除《唐诗大系》一种外,其余内容均是新增的。第9卷庄子编增加著作3种,内容为原有的5倍。第10卷文学史编、周易编、管子编、瓊堂杂业编、语言文字编的内容大都 是新增的。第11卷为美术卷,收入闻一多绘画作品38幅、书籍装帧及设计37幅、书法作品52幅、篆刻561方,这不仅是旧版全集所没有的,也是新编全集的一大特色。第12卷收入书信215封,旧版全集仅收37封,日记系新增加的。限于篇幅,这里不能将新编全集增加的篇名、内容一一详加介绍,只能述其大要,好在旧版全集并不难找,细心的读者可以把两种版本对照阅读,新增内容便一目了然。应该说,新编全集收录闻一多著作是颇全面的。

新编全集的另一重要编辑原则是真实,就是要忠于原作,保持原貌,为读者提供可信的版本。因此,收入新编全集的文章,无论是旧版全集或其他集子已载的,还是后来经人发现重新发表的,都一律根据最初的版本或手稿进行校订。这方面我们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了查找最初发表的版本,我们曾多次到武汉、北京、昆明、上海、重庆等地的图书馆,翻阅与闻一多有关关系的多种报刊。有少数文章原始版本实在无法找到,均注明根据何书、何刊编入。除了明显的误植或笔误应予改正外,一般不对原文作任何改动。在整理那些不经改动无法收入全集的未完、未定稿时,凡对手稿作了重要增删更动之处均加注说明,以便读者了解手稿的原貌。对闻一多著作中原有的注条则注明为“作者原注”,以便与整理编辑者的注文区别开来。对旧版全集或其他选本收录的文章,整理时既尊重原编辑者的劳绩,也参照最初版本或手稿对存在的问题作适当处理。比如,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就有几种不同的版本。《民主周刊》第3卷第19期刊载的这次讲话(原题《闻一多同志不朽的遗言》)的内容最为详尽,其中有一段怒斥蒋介石反动派的话:

你们完了,快完了!你们以为打伤几个,杀死几个,就可以了事,就可以把人民吓倒了吗?其实广大的人民是打不尽的,杀不完的,要是这样的话,世界上早没有人了。你们杀死了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你们看着我们的人少,没有力量。告诉你们,我们的力量大得很!多得很!看今天来的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力量!此外还有广大的市民!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不都在人民之前倒下去了吗?翻开历史看看,你还站得住几天!你完了,快完了!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我们看,光明就在我们的眼前,而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

这段话见肝见胆,掷地有声,充分表现了闻一多的铮铮铁骨和对人民事业的必胜信心。旧版全集的编者可能迫于当时国统区的情势,不能不有所顾虑,便将这段话删去了。1950年10月,李广田在编辑《闻一多选集》(1951年7月北京开明书店出版)时,将旧版全集删去的这段话恢复了,却又将《最后一次的讲演》的另一段话删出了。被删去的那段话主要是肯定美国的开明舆论和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其中说:“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美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在50年代初抗美援朝的政治背景下,《闻一多选集》的编者删去这段话是自然的。本着全面、真实的编辑原则,新编全集将以上两段曾被删去的话,全部恢复了。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闻一多当时的思想面貌。要知道,闻一多是在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的第五天讲上面这段话的,而且在讲话的当天就惨遭敌人暗杀;我们不能要求闻一多在当时就能预见到后来局势的发展和司徒雷登任期内的表现,并对其进行批判。删去这段话固然适应了50年代初期政治形势的需要,但从历史的眼光看却不利于人们了解闻一多的真实思想面貌。这种删改旧作的情况并不限于闻一多,在不少作家的作品中也是存在的;但事实证明,根据今天的认识或需要,对过去公开发表的作品进行删改,是违背历史真实的,往往弊多利少。

新时期以来,一些闻一多的佚文陆续被发现并重新发表,也有个别手稿被整理刊发,这些工作对推动闻一多研究都是有益的。但也有个别整理者态度不够严肃,以至造成一些不应有的错误。比如有一本《闻一多诗集》,收录了《真我集》中的11首诗,就有错题、错字、漏字及衍文共计152处。有些重新发表的佚文在标点断句

方面也有不少毛病。另外,旧版全集《现代诗抄》目录标明收徐志摩诗12首,实为13首,有一首《多谢天!我的心又一次的跳荡》因编者将诗题误为诗行,故使该诗混于前一首诗《毒药》之内。鸥外鸥诗目录标明仅收一首,实为4首,因另署失名的诗实为鸥外鸥所作,而目录标明收失名诗2首其实是3首,内有一首《男人身上的虱子》亦因将诗题误排成诗行,便混于前一首诗《都会的悒郁》中。新编全集对上述一类问题十分重视,均一一加以订正,使整理后的闻著能够做到准确、可信。

由于贯彻了全面和真实的编辑原则,所以新编全集提供了许多真实可信的新材料,使读者更清楚地看到了一个完整的、立体的、有血有肉的闻一多,更加崇敬他的道德学问,也获得了许多新的知识和看法,澄清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比如,关于闻一多的最早作品问题,旧版全集所收最早文章为1922年出版的《冬夜评论》,最早的新诗是1923年出版的《红烛》,而新编全集收录的最早文章是1913年发表的《名誉谈》,最早的新诗是写于1919年底和1920年的《真我集》,这就将闻氏开始发表文章的时间提前了近十年,开始写作新诗的时间提前了两年。《名誉谈》一文由闻一多的孙子闻黎明发现并已收入所著《闻一多年谱长编》,但据称登载此文的原刊清华学校《课余一览》第1期第2号已残,且目录署名闻多,正文又署名“漱仙”,似乎还存有疑点。即使除开此文不计,发表于1916年的《二月庐漫记》也比《冬夜评论》早整整六年。同时,新编全集还收录了闻一多在清华求学期间所写的大量诗文和书信,这是研究闻一多早期生活和思想的珍贵资料。

又如,现在有一种带普遍性的看法,认为闻一多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是从1928年秋到国立武汉大学任教,受到学衡派轻视新诗创作,注重朴学传统气氛的无形压力才开始的。从新编全集提供的新材料看,这一看法应该加以修改,在来武汉大学任教的前几年,闻一多已开始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但他专攻古代文学则是到武大后开始的。这里仅举出两分材料:一是1926年冬致饶孟侃信,闻一多在信中明确地说:“别后诗思淤塞,倍于昔时。数月来仅得诗一首,且不佳。惟于中国文学史,则颇有述作。意者将来遂由创作者变为研究者乎?”可见他当时已有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述作和志向。二是第3卷新增论文《诗经的性欲观》,此文原载1927年7月9日至21日《时事新报·学灯》,朱自清在旧版全集《跋》中说,曾将此文编入拟目,但始终未搜寻到。在这篇文章里,闻一多用社会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新的观点和方法研究《诗经》,提出“《诗经》是一部淫诗”,存在“明言性交”、“隐喻性交”、“暗示性交”、“联想性交”、“象征性交”五种“表现性欲的方式”,并运用音韵、训诂知识详加论证。这是他研究《诗经》的最早论文,后来他在《诗经》研究方面提出的许多富有创见的观点,都可以在这篇文章里找到雏形。

闻一多由信奉国家主义,误解甚至反对共产主义,到接近、向往共产主义,其思想发展是经历了曲折坎坷的。新编全集收录了反映这一发展过程的所有文字,不为贤者讳。第2卷新收录的《恢复和平》一文就反映了闻一多早年对共产主义的错误认识,我们认为在新编全集中保留这类文章,正好说明了共产主义思想的伟大、正确,具有永久的生命力。尽管闻一多早年对共产主义认识错误,但他最终还是向往共产主义的。同时,新编全集对研究闻一多的文艺思想、哲学思想、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都提供了许多新的资料,它的出版必将推动闻一多研究的深入发展。

注 释:

①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

(责任编辑 张炳炫)